

东亚活字印刷术在世界史上的价值

徐忆农

摘要 在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史相关著作中,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活字印刷技艺的历史价值认识尚不够充分。论文认为诞生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古代东亚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东亚造纸和印刷术对欧洲印刷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认为中国活字印刷术未盛行世界的深层原因应该与社会需求有关。结论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过积极贡献。

关键词 活字印刷 世界史 中外文化交流

分类号 G251.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11.009

The Significance of East Asia Typography in World History

Xu Yinong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East Asia typography has not been fully noticed by the catalog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me world history books written by western scholar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ypography which was born in China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East Asia civilization, and the East Asia papermaking technology typography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printing. This paper also thought that the unpopularity of Chinese typography may be relevant to social requirements. The conclusion is typography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ivilization.

Keywords Typography. World history. Communication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0 引言

东亚是印刷术的诞生地和成长地,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东亚古代的印刷术大致可分为雕版、活字与套色三种印刷术。2009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China engraved block printing technique)”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雕版印刷技艺“开创了人类复印技术的先河,承载着难以计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起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1]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Wooden movable-type printing of China)”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中国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技术之一。浙江瑞安保持了这门技术,那里依然使用这种技术编印谱牒……。但从英文名称和中文介绍看,此项目仅涉及木活字,而印刷品也仅提及谱牒,完全没有述及其在世界史上的价值。与此同时,在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史相关著作中,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活字印刷技艺的历史

价值认识尚不够充分。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指出,“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2]在此文中,培根虽然赞扬了印刷术对世界的贡献,却称其起源“还暧昧不彰”。

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他在1983年出版的《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3]一书中承认,中国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很久就已试用活字印刷了,而且简要介绍了宋元时期沈括、王祜所记录的胶泥、铸锡、木刻等活字印刷技艺及其在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与演变过程,但仍把德国的谷登堡看作是“发明印刷术的人”,或

者至少是“活字”的发明者。因为作者认为谷登堡是一位以机器做书写工作的新世界的先知。在那个世界里,印刷术可以代替缮写室,而知识也就可以传播到无数看不见的社会中去。

1999年出版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9],由美国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与哈罗德·多恩二位当代职业科学史家合著。此书可以说是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世界通史。作者特别强调,在谈论中国的技术时,我们不要仅仅注意到中国人领先于其他文明的这种或那种发明,这一大批“第一”确实令世人瞩目,但对此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其价值非常有限。中国在7世纪的头十年出现了木板印刷术。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出现在1040年左右,那项技术传到朝鲜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5世纪30年代后期,显然与亚洲的印刷术发明无关,谷登堡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项意义重大的新技术在1450年以后逐渐传播开来,使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化面貌为之一新。这种新型媒介导致了一场“交流革命”,使人们能够获得大量十分准确的信息,也使得抄写图书成为过去。

进入2000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所著的《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10]开篇提出“哪些事件应该写进历史”的问题。在作者眼中,一部世界史,重点要确定历史转折点在哪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技术”的概念和“世界五大文明”的学说。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发明都重大到足以改变历史。每一种文明都是以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术的引入为开端的,文化技术是文明背后的决定因素。文明一,始于原始的或表意文字;文明二,始于字母文字;文明三,始于欧洲的印刷术;文明四,始于电子通信技术;以及文明五,始于计算机技术。在这里,没有一项是东亚的贡献。

实际上,中国的印刷术比欧洲早出现数百年,中国在7世纪发明了雕版印刷术,11世纪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5世纪中期,欧洲德国的谷登堡才制造出铅合金活字。为什么印刷术被认定是欧洲的贡献呢?作者在书中说,印刷使文字靠近了大众,它培育了一种更加精确的思想方式,这对于现代的学术和科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印刷术从中国传播到了西方,谷登堡对活字的最先使用导致了印刷文献的激增。由于欧洲人的书面文字基于字母系统,这使批量生产变得十分经济,因此能够比中国人更有效地开发这一技术。尽管印刷术很早就在中国和朝鲜使用,但因为文字的不同,它在东亚社会的使用并没有达到西欧使用的程度。

那么,我们该怎样认识东亚活字印刷术在世界

史上的价值呢?

1 诞生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古代东亚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

雕版印刷术至少在中国唐代(618—907年)已出现,在15世纪中期德国谷登堡研制出铅合金活字前,是世界范围使用最广泛的印刷术,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美国菲利普·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中说,“中世纪”一词是欧洲人在17世纪新创的,意即处于光辉灿烂、成就显赫的古典希腊罗马与他们自身所处“现代时期”之间一个长期的、灰暗的时期。中世纪大约开始于公元600年左右,结束于约1500年。尤其是中世纪早期(600—1050年),西欧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准确实都非常低^[9]。中国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却日益走向其发展的顶峰。在谷登堡之前,欧洲的手抄本书籍仅可以千计,当时欧洲的人口大概不满一亿,大多数人不识字。由于有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中国的书籍是全世界总和。雕版印刷术是将图文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质料的板上,制成版,然后在版上加墨印刷,因而也叫整版印刷术。由于雕版印刷术每印一叶书就要雕造一块书版,造成人力、物力浪费很大,于是到了11世纪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有一位叫毕升的人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升发明的活字与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并无实物存世,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活字印刷术明确的发明者,是因为北宋沈括(1031—1095年)在其不朽著作《梦溪笔谈》中对此事进行了较详细记载。

由于活字本印制方式特别,又由于首次记录毕升发明“活版”的沈括是“中国历史上兴趣最广博的思想家之一”(英国李约瑟语),其著作《梦溪笔谈》自问世起关注者一直不乏其人,以至于影响人们对活字印刷术也颇为留意,文献记载从宋至清连绵不绝。如南宋周必大(1126—1204年)著《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称用沈括所记的方法,以“胶泥铜版”印自著《玉堂杂记》;元姚燧(1238—1313年)在《牧庵集》载姚枢(1201—1278年)教学生杨古用“沈氏活版”,刷印了《小学》《近思录》和《东莱经史说》等书;元王祜在《农书》中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叙述用泥、锡、木造活字与排印的方法,并称以所造木活字印刷过《旌德县志》100部;元李洵孙(1243—1329年)撰《知州马称德去思碑记》载马称德“活石板镂至十万字”。明陆深著《金台纪闻》中有“近时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之语。这些文献记载的活字与活字印本虽无一存世,但如果将其与目前存世的活字实物、活字印本顺次排列,就可大致理清中国活字印刷术的演进历程。

首先,中国活字印刷术问世近千年来,一直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且从技术层面看,一度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制字材料方面,中国古代曾使用过泥、木、锡、铜、铅等活字。在制字方法方面,活字有刻字与以字模翻制之分。木活字自然只能刻字,但元代王祜是先刻字后分割成活字,而清代金简(?—1794年)是先制成木子后刻成活字。泥活字在毕升时代是一个一个刻上去的,但清代翟金生泥活字有以字模翻制而成的。在文献记载中,元代王祜曾提到“铸(或作注)锡作字”,说明在王祜之前,中国已有用字模铸造的金属活字。明华燧(1439—1513年)的传记资料有“范铜为版,镂锡为字”之语,但也称“范铜板、锡字”,而清代林春祺(1808—?年)撰《铜板叙》载其所用铜字为“铸刊”的,说法不一,有待考证。虽然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要比刻复杂,难度也大得多,但我国的金属铸造工艺,早在商周时代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铸造或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被称为金文,常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钱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自商代起,青铜器上的文字就铸多于刻。因而金属活字刻字还是铸字的争议仅是史实的考证问题,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实现的。从外观上看,毕升发明泥活字应是雕版上的文字一样,为阳文反字,其后直至谷登堡的铅合金活字也是如此。例外的是清代吕抚(1671—?年)印其自著《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衍义》使用的泥活字,被称为“字母”,是阴文正字,类似于铸字用的字模。从排印方式上看,中国古代多是用活字摆成一版而直接刷印的,但到了清代雍正末乾隆初,即1736年前后,吕抚制造阴文正字的泥“字母”,用来压制阳文反字在泥版上而再刷印上纸,这是活字与整版相结合的印刷方式,如果不考虑字体因素及多人同时排印等情况,理论上无须造重复字就可排版刷印书籍。而从毕升起直接用活字来排版刷印的方式,就要将常用字“之”、“也”等重复多刻一些,不然几乎连一版书也排印不出。现在知道元代王祜刻制木活字是3万余个,马称德(?—1322年)刻制木活字为10万多个,清代金简主持武英殿刻木活字是25万余个,清道光林春祺刻制大小铜活字则达40多万个。字数越多,其制字、存储、拣字、归字所费人力物力都随之增加。而吕抚在实际操作时,称制3000余字可印文章,制7000余字可印古书,这是已知史料中,中国古代以最少的汉文活字来印刷书籍的记录,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上是个奇迹。同时,吕抚之法还克服了活字版不能保留整版的最大弊端,为世界已确知的泥版印刷之始。直到1804年,英人斯坦荷普伯爵以泥覆于活字版上,才制作出用

来浇铅版的泥版。泥版易散碎,至1829年法人谢罗用纸型代替泥版,纸型可以多次浇版,从而解决了保留整版的问题,但仍需造重复之字。19世纪80年代美国首先制造出实用的英文打字机,使用活字冲击而制版,这种活字是无须制造重复之字的。但打字机多用于制成供油印的蜡纸孔版,印刷效果不佳,因而直到20世纪中后期,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字印刷方式,还是谷登堡铅活字与纸型浇铸铅版的组合模式。如果排除材料的因素,可以说18世纪吕抚的活字泥版刷印术,在排印程序上,拥有其同时代最先进的理念。

其次,活字印刷术在今天看来明显比雕版印刷术先进许多,但直到西方现代印刷术传入之前,中国图书长期是以雕版印刷术为主的。郑如斯等先生在《中国书史》中统计《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约2万部书,活字本220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约1.1万部书,活字本150余部^①。笔者统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近5.7万部书,活字本约340部。平均计算,活字本在中国古籍中仅占1%左右。另外,从目前研究成果看,中国古代的家谱有许多是以活字排印的。据张秀民先生统计,日本出版《宗谱的研究》著录1228种我国家谱中,612种为木活字本,占总数的近50%。因此,除家谱外,活字印本在中国古籍中占的比例,或许不到1%。

第三,由于活字印刷术在古代中国未被普遍运用,而人们往往又有物以稀为贵的心态,因此古代活字印本自然被收藏家视为珍籍秘本,于是我们今天还可以领略到各个时期活字印本传世之作的多彩风貌。中国宋元时期活字印本,存世非常稀少,其中20世纪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本佛教书籍现为学术界所认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陆续公布17部西夏至元代活字印本,另还有不少藏于域外。与此同时,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敦煌石窟发现了960枚回鹘文木活字,今藏巴黎。其后,我国与俄国考古人员又陆续有新的发现,目前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已逾千枚。而汉文活字印本目前尚存在争议,如温州出土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有人认为是北宋活字印本,也有人认为是雕版印本。明代活字印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的最早一部书是明弘治三年(1490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有学者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推论它是锡活字印本而非铜活字印本,因而比较稳妥地说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许多学者发现,中国古代铜活字印本(或称金属活字印本),大部分出现于弘治至嘉靖间,如当时无锡华氏与安氏所印之书至

今存世还较多。分析原因,周叔弢(1891—1984年)先生认为“是从朝鲜传播而来”,而赵元方(1905—1984年)先生认为是“商力渐充”与“产铜日旺”造成的结果。当然,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明代也有不少活字印本未著录制字材料,其中有木活字印本,也有造字材料不详的活字印本,由于缺乏文字描述,仅靠目测难以分别,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清代活字印本相对于其以前各代来说,存世数量较多,印刷方式也丰富多彩,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清朝政府直接组织人力、物力造活字刷印图书,如清廷雍正时用所造铜活字印制完成字数达1.6亿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造木活字刷印篇幅达数千卷的《武英殿聚珍版书》。这种直接参与的行为,无形中带动了民间活字印刷术的运用与推广。如吕抚、李瑶、翟金生、林春祺等人以较大精力从事泥、铜活字制造或改进工作,传世之作虽不多,但风格各异,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与此同时,《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木活字排印本汇编丛书达18种,从最早的清乾隆木活字排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书》开始,到其后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各朝皆有木活字排印本丛书存世。这应该不是巧合。因为木活字在我国古代常常用来摆印家谱。大量摆印普通典籍,看来与聚珍版书不无关联。而清代后期,许多活字排版印本称“聚珍”本,更是明显的例证。如清李兆洛撰《养一斋文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维凤堂活字印本,书名叶题“维凤堂聚珍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翟台纂修《泾川水东翟氏宗谱不分卷》,清咸丰七年(1857年)泾川翟金生泥活字印本,书名叶题“大清咸丰七年仲冬月泥聚珍板重印”,安徽省图书馆藏。

第四,在古代中国,活字印刷书籍总量虽然有限,但内容广泛,可以说经史子集丛五部皆备,如明铜活字蓝印本《毛诗》、明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明嘉靖三十一年芝城铜活字蓝印本《墨子》、明铜活字印本《曹子建集》、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书》,等等。前文已述,中国古代的家谱有许多是以活字排印的。因为家谱是时常变动的,所以活字常常在古代用来摆印家谱。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国家史(如二十四史)、地方史(各种地方志)、家族史(以家谱为代表)和个人史(如个人传记)四个层次的古代史书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资料。以前人们更多关注王侯将相,但是家谱把目光投向了普通人,对于研究民风民俗、民族迁徙、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都很有帮助。除家谱外,活字印本在中国古籍中所占比例虽少,但也发挥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重要作用。如

《开元天宝遗事》是五代王仁裕撰写的笔记小说,其中保存不少唐代社会史料,是从其他正史中所不能见到的,可补史书之阙。而国家图书馆藏明建业张氏铜板印行本《开元天宝遗事》,是以活字据宋陆游之子陆子适桐江学宫刻本摆印而成,宋刻原本今已无传,故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此活字印本题有跋语云:“古书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也。”与此同时,有些珍贵的活字印本经后世翻印,成为不少通行本的祖本。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明活字印本《晏子春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顾广圻为吴薰校刻,即据此本影刻。《四部丛刊》印本,即据此帙影印。另外,中国古代有部分传世名著之首版是以活字印本行世的,如清代乾隆萃文书屋活字印本《红楼梦》、道光邵阳魏氏木活字印本《海国图志》,皆为最好的例证。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诞生后,很快就向周边国家传播。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内发现的汉字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国学者考订认为该经是8世纪初唐朝刻印而由僧人带入半岛的^[7]。在古代东亚,使用活字版印书最多的是朝鲜半岛。从现在已知的材料看,从高丽时代起,朝鲜半岛就出现了活字印刷术。按照韩国的文献记载,1234年宰相晋阳公崔怡(1195—1247年)用铸字印成《详定礼文》二十八本,这一记载被称为世界最早的使用金属活字印刷的记录。韩国现存最早铸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兴德寺印的金属活字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被称为存世最古金属活字印本。从高丽至朝鲜时期,活字印刷术不断发展起来,曾用木、陶、瓢、铜、铁、铅等各种材料制造过活字。据张秀民先生《中国活字印刷史》^[8]考证,仅1376年至1895年,已知雕造木活字28次,1403年至1863年铸造金属活字34次,内铅字2次,铁字6次,余皆为铜活字。又据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介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82万枚古活字,其中金属活字50万枚,大多是17—20世纪初朝鲜中央政府和王室使用的。其他类活字还有木字、铁字、泥字等,以及活字储存柜、活字制作陶模、工具、活字分类目录等,为了解朝鲜活字制作、分类和检索提供了珍贵资料。如此巨大的馆藏堪称世界最大的古代印刷活字宝库,很多内容都值得认真研究。

朝鲜半岛出现活字印刷术,与中国活字印刷术有何关系呢?1234年,高丽出现活字印刷术之时,中国正处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在此前后,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高丽使节入贡中国,宋朝皇帝先后将《大藏经》《文苑英华》等许多重要典籍送给高

丽。宋朝人往使高丽时,亦把高丽的一些书籍带回来,说明当时宋朝与高丽之间是有交往的。15世纪朝鲜金宗直(1432—1492年)是一位有着许多追随者的有名望学者兼官吏,他在跋朝鲜活字本《白氏文集》中说:“活板之法始于沈括,用铸字印书,凡经、史、子、集,无家不有。”虽然将毕升误说成沈括,但说明《梦溪笔谈》早已传入朝鲜半岛,故为该国学学者熟知。总之,高丽出现的活字印刷术晚于毕升,而当时高丽与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因而高丽出现的活字印刷术是有可能受中国毕升发明的影响的,这一点也为古代朝鲜学者承认。朝鲜半岛的古代出版物,今日有学者习惯于称“高丽本”,黄建国等先生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一书,收录中国51个单位所藏“高丽本”2754种。其中铜活字印本86种,以大连图书馆藏朝鲜太宗十六年(1415年)铜活字印本《东国史略》为最古;木活字印本397种,以上海图书馆藏“明宣德三年”(1428年)朝鲜木活字印本《文选五圣并李善注》为最古;铁活字印本2种,较珍贵的为朝鲜哲宗时铁活字印本《鲁陵志》,国家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瓢活字印本1种,即朝鲜瓢活字印本《论语集注大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另外还有刊本1193种,稿抄本288种,石印本10种,铅印本36种。由此推算,传统活字印本占30%左右,所占比例相当可观。此外,黄建国等先生还在书中介绍说,“与中国印书以雕版为主的现象相反,高丽印书的特点,是活字压倒雕版。”^[9]说明在古代朝鲜半岛,传统活字印刷术已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

日本的活字印刷术,一般学者以为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洋活字,因所印多为教会宣传品,故在当时影响不大;另一来源为从朝鲜传入的汉文活字。1591年,欧洲铅活字印刷术传入日本,称“切利支丹本”。1593年,日本用活字印成《古文孝经》,一般学者以为是日本第一部传统活字印本,现已不存。1597年,日本木活字印本《劝学文》,称“此法出朝鲜”。据张秀民先生《中国活字印刷史》载,日本知有活字印刷术,在日本文禄元年(1592年),相当于明万历二十年,当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在汉城发现铜活字、活字印刷工具及活字印本图书,于是将其抢回日本,所以在初期日本活字本中常有“此法出朝鲜”之语。第二年即1593年,日本用这些抢来的活字及印刷工具,印成了《古文孝经》。日本庆长二年(1597年)天皇下令仿朝鲜铜活字雕木活字。日本庆长十年(1605年)德川家康命在圆光寺以《后汉书》为字本,铸造大小铜活字10万,第二年(1606年)完工,实造91255字,献给后阳成天皇,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铸造活字。中国人

林五官参与此事。但是严绍盪先生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书中,对上述观点表示怀疑,他指出:“若推考日本近世活字印刷的源头,恐怕应当推古活字本《五百家注韩柳文集》。……古活字本《五百家注韩柳文集》似应刊行于1396年,若与文禄年间《古文孝经》相比较,则早了一百八十余年。这一技法大概是元末明初中国人东渡日本时带入的。至庆长年间,依靠朝廷的财力,便得以推广。”^[10]严先生看来也只是推测,还不算最后的结论。总之,不管日本的活字印刷术是间接传自朝鲜,还是直接传自中国,都是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延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许多中国汉籍,都有日本刊刻、摆印本传世,被学界统称为“和刻本”^[11]。如唐代魏征等撰《群书治要》一书,日本存平安、镰仓时代写本,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据金泽文库旧藏古写本用铜活字付梓出版,此后又出现日本天明七年(1787年)尾张藩刻本,此书在中国宋初已失传,幸有和刻本传世,现有多本藏于中外众馆。

越南历史上有记录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木版印刷的户口帖子。1712年,越南出版的《传奇漫录》据说是最早的活字本。1855年越南又从中国买去木活字印刷《钦定大南会典事例》^[12]。由此可见,越南的活字印刷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2 东亚造纸和印刷术对欧洲印刷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

当毕升发明活字400年后,在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约1394—1468年)根据西方拼音文字的特点,研制出字模浇铸铅合金字母活字。他发明了木制印刷机,开创了印刷机械化的先河。因而西方人长期认为活字印刷术是谷登堡发明的。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沈括《梦溪笔谈》所载毕升发明活板一节译成法文,于是较多的欧洲人才知道,在谷登堡以前中国人早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不过,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谷登堡研制铅合金活字有没有受到东亚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影响。美国丹尼尔在《发现者》一书中介绍,有些历史学家曾经提出,早于谷登堡一个半世纪的远在朝鲜所进行的活字印刷工艺试验,也许给予谷登堡以极为重要的启发。但丹尼尔在书中说:“不过没有任何足以说服人的证据能说明谷登堡曾经听到朝鲜人用活字印书的片言只句。”然而,目前我们有一些材料可以证明,谷登堡的研制与中国不是没有关联。

首先,纸是一种重要的印刷材料,1150年,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1312年,造纸术由意大利

传入德意志。而丹尼尔在《发现者》一书中也明确表示,纸张是中国对书籍发展所作的极其重要的贡献。

其次,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是由雕版印刷术发展而来的。在蒙古入主中土之前,中国和欧洲很少有直接交往,而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此时东西经济和文化正面相遇,直接进行了交流。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中国来,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克·波罗,他于1271年自家乡启程,沿古代丝绸之路东行,于1275年到达中国,留居17年之久。后经其口述,他人笔录,诞生了举世闻名的《马克波罗行纪》(又译《马克·波罗游记》)一书,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这部书有一章专门介绍元朝政府制造纸币的情况^[13]。张秀民等先生根据有关史料分析,认为元代的纸币是用木版与铜版印刷而成的。1310年,波斯(今伊朗)史学家拉希德·丁(1248—1318年)著《世界史》,书中介绍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这部书后来流传到欧洲。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年代的木版画是在德国南部发现的刻于1423年的《圣克利斯道夫像》。与此同时,德国出现最早的插图活字印本《珠玑集》,是1461年左右用木刻图版与活字版拼版印制的^[14]。另外,丹尼尔在《发现者》一书中介绍,雕版印刷传至西方,也许是以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雕版图画为媒介的。那就是纸牌,它和骨牌一样,似乎都发源于中国。玩纸牌的风气当时在西进的蒙古军队中似很普遍。这种印刷的纸牌到1377年在德国和西班牙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而且风靡一时。有位神秘的“纸牌大师”(约1430—1450年)印制了一套精美的纸牌,有人认为是谷登堡本人所刻。当纸张的雕版印刷最后在欧洲出现时,使人想见这一切都是从中国传来的。由此说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路是相通的。虽然位于中国西部诸国,在相当于宋元时期,目前还未发现有活字印刷活动的记录,但元王朝的政权混一欧亚,在东西方相通的时代,整版印刷术既然可以由东向西传播,活字印刷术也是有机会同步相随的。

第三,从现在发现活字印本和活字实物看,活字印刷术在12至14世纪就传到了西夏和回鹘等异族地区。20世纪出土的活字印西夏文佛经,仅距北宋毕升发明泥活字约一百多年^[15]。西夏是党项拓跋氏所建王朝。1038年元昊(1003—1048年)称帝,至西夏宝义元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共历十帝,凡一百九十年。最盛时辖二十二州,先后和辽、金及宋鼎峙。西夏活字本的产生,可以推测为,一是可能受《梦溪笔谈》的影响。因为《梦溪笔谈》的著者沈括在宋夏边境率兵驻防,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引兵扰边,沈括师

鄜延路师击破西夏七万之众。说明沈括与西夏人进行过直接的接触。虽然相互为敌对的国家,但人们对胜利者总是心存敬畏。加上汉族文化有极强的同化力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另外,《梦溪笔谈》中直接记载了有关西夏文创制之事,说明沈括对西夏文化有所了解。因此,西夏人接触《梦溪笔谈》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二是可能受汉族实际的印刷实践活动影响。今日之所以没有发现与西夏文活字本同时期的汉文活字本,并不是说明汉族人无实际运用活字印刷技术,而是从西夏的地理环境看,气候干燥,易于纸本文献的保存,且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较短,在其消亡后,西夏文已无多少人可识,又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使其文化典籍免除许多人为的灾难,故幸存今日。三是西夏文的字数较少,共六千多字,也便于造活字。四是西夏文颁行于广运三年(1036年),与毕升发明活字的时间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西夏文可能开始印书不久就使用活字,成为后世的成法,也许这是今天存世西夏文活字印本较多的最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许多学者认为20世纪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约出现于1300年前后。也有学者考虑到回鹘在敦煌的活动情况及莫高窟兴衰的历史,将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16]。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实物。这个时代正是西夏活字印刷术兴盛的时代,而回鹘与西夏关系密切,完全有可能在印刷技术上互相有所影响。1450年德国谷登堡研制出铅合金活字,不仅比11世纪中国毕升发明的泥活字晚出现400年,也比回鹘文木活字晚出现上百年。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是回鹘人采用粟特字母创制的文字。粟特为中亚古地名,粟特字母来源于阿拉米字母。约公元前13世纪,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叙利亚沿海一带)人,主要依据古埃及文字制定了历史上第一套字母系统,它们衍生了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是亚洲许多文字的基础,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全书》中有一部分是用阿拉米文写的。腓尼基字母在传入希腊后产生了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后来又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因此腓尼基字母成为欧洲以及后世西方文字的渊源。所以可以说,腓尼基字母是世界大多数拼音文字的来源,也就是说,现在发现的木活字回鹘文,与德国谷登堡铅活字所用的拉丁文,都是腓尼基字母的“后裔”。另外,古代回鹘人活动的地区,处于中原与西方的中间地带,因此回鹘文木活字,有可能起着中国印刷术与谷登堡制造铅合金活字之间的桥梁作用,在印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前期,美国卡特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7]中表示,现在要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朝鲜的活字印刷与欧洲的活字印刷没有直接的关系,还嫌过早。是中国首先发明了造纸和印刷,并对欧洲造纸和印刷事业的开始,都起了决定性影响。今天看来这一推论仍是令人信服的。

谷登堡排印的书籍,以1455年铅活字印本《四十二行圣经》影响最大。从谷登堡印刷《圣经》开始,铅活字印刷术迅速向别国扩散,逐步成为世界上的主流印刷方式。1590年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澳门用西方活字印刷拉丁文《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这是现代铅活字印刷术首次登陆中国,但只是匆匆而过,没有停留。直到19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印刷术的西法东渐时期,其间,铅活字凸印率先传入,随后,石印术、平版胶印、雕刻凹版、照相凹版、泥版与纸型铅版、珂罗版等也相继传入,从此,中国的印刷事业迈入了近代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的手工雕版、活字印刷术虽与之并行一段时期,但由于技术落后,最终为之所取代。如果说中国古代印刷术完全是以人的手工技艺为特征进行图文刷印的话,那么近代印刷术则主要是由人驾驶的动力机械来完成图文转印的。这一切,与谷登堡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3 中国活字印刷术未盛行世界的原因

在古代中国,图书长期是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抄写为辅,而活字印刷术在发明后的几百年中,虽时时有人运用并改进这项技术,印出的书籍却很有限。

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技术水平上存在一定问题,如雕版印刷所用水墨,基本不能用于金属活字印刷,如果不改变墨性,就制约了活字材料的改进;再如中国古代活字许多为用原生性木材镌刻而成,不如金属铸造活字能产性强,阻碍了活字印刷术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同时,汉字自产生数千年来,一直处于表意体系阶段,字数越来越多,汉代许慎撰《说文解字》,连重文在内仅收字10 516个,而当代《汉语大字典》收字56 000个左右,这样多的文字,就是不造重复之字,其制字、存储、拣字、归字均费时又费力,如果以完整过程看,传统活字印刷术也许并不如雕版印刷术方便快捷。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应该与社会需求有关,因为“需求是发明之母”。如中国古代用金属版印制图文有着悠久的历史。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铜版,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已用铜版在丝织品上印花。宋代的纸币、商标广告也是用铜版印刷。这些铜版实物都流传至今。这证明,至少在宋代,已解决了

铜版印刷的制版与用墨问题。而中国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已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但从汉代以后,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把儒家学说当作治国之本,整个社会长期受其支配。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是读书人的主要生存之道,而各级科举考试着重考查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史和学术知识,因此这些著作需要重复印刷。但长期以来,活字印刷术不能保留整版,常常是随时需要随时排印,对于经常有需求的图书,相比之下,可反复刷印的雕版要方便得多。虽然据中外学者统计,在15世纪欧洲广泛使用印刷术以前,中国抄、印本总的页数要比当时世界上用一切其他语言文字集成的页数总和都多^[8],但其中显然有不少重复印刷的书籍。重复就意味着停滞,没有对新知识的渴望,也就没有对活字印刷术的需求。由于中国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读经求功名上,自然使其创造天性渐渐磨灭了。于是,当19世纪西方“具有智力”的列强闯入的时候,主要靠科举入仕者掌管的国家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此国破家亡之际,儒家学说派不上用场,也来不及在本土上产生足以自强的新思想,域外强者的理论观念自然被吸纳进来。虽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始终未能脱离手工劳动方式。当各种新知识、新思想需要迅速传播时,近代铅活字机器印刷技术就体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取代了所有传统印刷术,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流印刷方式,最终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西方人仍坚持认为活字印刷术是谷登堡发明的,毕竟中国人直接用传统活字印刷的书籍,几乎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过什么影响。而由谷登堡改进并使用活字印刷术后,书籍的生产量大大提高,使更多的人能接触知识,摆脱愚昧。可以说正是这些纸质印刷品解放了人们的头脑,人类才走向一个更为理性的新世界。活字印刷术出现在欧洲,很快成为生产图书的主流印刷方式,并形成一种庞大的印刷工业,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最终使西方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发祥地,因而有“文明之母”之称。

4 结语

图书是记录和传播知识的工具。而作为诞生于中国的印刷术,则是图书的一种重要生产技术。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图书采用的是以抄写为手段的复制方式,费时费力,复本稀少,很难满足人们阅读的需要。印刷术发明后,图书能够比较容易印刷出许多复

本,便于长久保存,并得以广泛而迅速传播,进而使知识得到普及。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活字印刷术,自宋代发明后,很快传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其后又向西传入西夏与回鹘地区,最后很有可能传至欧洲。活字印刷术自传入异域后,在外

邦智者的努力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传播知识与思想的手段之一,从而推动包括近现代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活字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参考文献:

- [1] 培根.新工具[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3.
- [2] 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M].吕佩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3] 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 [4] 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M].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5]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M].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66.
- [6]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43.
- [7]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M].韩琦,增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4-26.
- [8] 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9] 黄建国,金初升.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1-6.
- [10] 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11] 王宝平.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2.
- [12]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418.
- [13] 马克·波罗.马克波罗行纪[M].冯承均,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37.
- [14]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术的诞生[M].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5.
- [15]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1):67-78.
- [16]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52.
- [17]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吴泽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 [18]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2.

徐忆农 南京图书馆国学研究所主任、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18。

(收稿日期:2016-08-20 编校:刘明)

(上接第8页)

我们承载着过去,我们面对着现在,我们展望着未来,而能够保证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唯有靠人类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是一种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则是通过两种形式,也正是中国古人所概括的“形而下者之谓器”与“形而上者之谓道”。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通过“道器”来保存和相传的。这是“天之所命”,所以一切肩负着传承人类文明之责的文化人,当有“为天地立心”(北宋张载语)之志;这是“经之所赋”,所以一切肩负着传承人类文明之责的文化人,当有“六经责我开生面”(明末王夫之语)之愿。作为典藏书籍的图书馆人来说,始终要将关注书写在“经史子集丛”这些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号召与上

述的志愿紧密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种使命,甚而说成为一种信仰,并化作我们图书馆人的自觉行为。北宋张载所说的“横渠四句”,或说“四为说”,是彪炳千秋的名言,是对肩负着知识和文化传承主体的士大夫,或说知识分子提出的标准和要求。这四句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我想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和我们图书馆人的使命提出我的“三为说”:为往世继绝学,为现世弘实学,为万世开新学。

徐小跃 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18。

(收稿日期:2016-08-20 编校:刘明)